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史料搜集与思考*

——兼谈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

Collection and Reflection on Film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Yunnan's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A Discussion on Constructing Chinese Frontier Film History

文 普泽南 /Text/Pu Zenan

提要: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启发,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电影史料的搜集,可以在电影与中国边疆社会构建、民族与边疆的影像表达、边疆流动电影放映、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四个方面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中国边疆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接续和补充,能为多学科提供立足电影的跨学科视角和资源,也是电影参与国家构建的亲证。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对更全面理解电影的中国性、电影与中国当代社会构建,更好地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边疆电影史 电影史料搜集 云南电影史

随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起步,基于中国本土的电影经验与实践,全面展现蕴含中国性和主体性的电影史,已经成为电影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受中国边疆研究立足边疆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这一观点的启发,⁽¹⁾本研究自2018年以来,以云南作为西南边疆的前沿,对云南省下辖的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电影史料搜集和田野调查,力图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对电影史研究的启示出发,探讨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的意义与价值。

一、从边疆认识中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电影史启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为立足于边疆的学术实践,为学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也启发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通过考察中国边疆的电影经验,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走出书斋,将视野转向中国边疆地区,从电影的基层实践出发,深入探讨电影与地域文化体系融合的历史轨迹,可以为中国电影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路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

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²⁾尤为关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两大历史遗产。⁽³⁾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发展同国家史地动态息息相关。19世纪末,北方领土被迫割让等问题使得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发轫,形成了“西北史地学派”。⁽⁴⁾20世纪20—40年代,在民族危亡以及全面抗日的背景下,有关边疆治理的边政学被提出。⁽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号召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掀起了第三次高潮。一系列以当代中国边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相继出炉,各民族与边疆各个时期的历史著述也不断涌现。⁽⁶⁾当下的边疆史地研究虽以历史学为基础,但跨学科的特性越发明显,成为了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⁷⁾“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互通、交融的趋势大大增强。”⁽⁸⁾

近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大热点在于反思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在以西方为圭臬而肇发的中国近现代学术中,有相当部分难以分清国家走向现代的行迹中哪些话语是西来的概念,又有哪些源于自身更加深远的历史传统。如今,西方概念无法适用和解

普泽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电影知识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10)阶段性成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放映史料调查”(项目批准号:YB202419)成果。

释中国自身现象的局限日益显现。因此，有声音开始呼吁边疆史地学者应当走出书斋，以中国为立场去探寻自身的经验，进而构建属于中国的边疆话语体系，“研究者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国历史疆域界说，进而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历史疆域理论”。⁽⁹⁾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融合了历史学与跨学科的综合特性。其研究宗旨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研究知识体系。这不仅包括提升对中国疆域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这两大特征的认识，还基于中国的具体实践，阐释国家发展中“统一”与“多民族”共生互荣的话语体系。⁽¹⁰⁾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对于电影史研究的最大启发，是通过认识中国的民族与边疆，学界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即探讨“何为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史可以从边疆视角探索电影的“中国性”问题。正如民族史学者王明珂所描述的，在白纸上画圆，这个圆的形状是由边缘的线条决定，因此，中国的边疆可以成为理解和观察中国的“最佳位置”。⁽¹¹⁾电影的“中国性”问题也通过边疆电影史可以得到深刻见解。

就电影史而言，世界电影史从针对具体的影片文本转向了研究影片曾经的放映空间以及传播形态，并被称为新电影史书写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¹²⁾中国电影史在不满足于单一历史观的背景下开始“重写电影史”，近年学者呼吁中国电影史研究应当“走出上海”，⁽¹³⁾以全国各地的电影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重绘中国电影的历史地图。

中国电影历经百余年发展，虽然看似短促，但恰与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大变局相伴。开阜通商、变法图强，随之电影舶来进入戏园，从杂耍影戏觉醒为本土文化载体，从摩登都市走向腹地乡野。新中国成立后，影像更是承载着新的精神，通过规模浩大的发行放映网络走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¹⁴⁾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历经多年发展，由革命历史观的独大走向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多样“重写”，进而由集中于上海、香港、天津等都市埠隅的研究面向更加深广的全国各个区域和层面。

如果“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¹⁵⁾那么走向中国

的最基层，寻求当地的电影经验，则有可能找到或至少寻得中国电影底色的一个侧面。如果边疆史地研究强烈地呼唤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实地的中国经验，那么走向边疆、乡野与基层势必可以探寻到中国独特的电影经验。因此，中国边疆电影史研究是探寻电影中国性及其主体性不可或缺的话题。

二、从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 看边疆电影史可能的研究方向

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研究，无疑要关注以边疆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电影作品，包括对反映边疆生活的故事片、纪录片、民族志影像等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历时性梳理，分析其艺术风格、叙事方式等艺术特征的变迁，探讨这些作品在反映边疆形象和边疆观念形塑方面的作用及得失。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的边疆民族地区缺乏独立制作电影的工业体系和人员保障，这让边疆自制的影片尤显珍贵，同时使得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活动主要围绕普及放映展开。因此，中国边疆电影史不仅需要考察以边疆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电影作品，还要考察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电影放映方式和观影环境，分析边疆民族地区观众的观影习惯、观影环境的变迁，以及探讨影像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效果及其社会影响。

基于这样的启发，本研究从2018年开始，对云南省范围内与邻国接壤的7个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田野调查。2018年1月、7月、8月、10月间集中在各地档案馆查阅档案；2019年4—5月前往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探寻当地电影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调查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及其流动放映；2020年7—8月以及2021年4—5月又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7个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田野调查；此后，陆续在云南各民族自治州、市进行史料搜集，搜集到电影工作资料、宣传资料、电影说明书、政策文件、书信手稿、电影志及其草稿、口述材料400余万字。

结合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的情况来看，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研究可以从电影与中国边疆社会构建、民族与边疆的影像表达、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 电影与中国边疆社会构建

自20世纪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边疆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边疆电影史需要追溯不同历史时期电影在边疆地区的制作和传播情况,分析电影对边疆社会的影响,以及电影在边疆地区社会功能的变迁。就云南而言,1949年前可查相关史料主要存于省级档案馆和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当时的报刊、电影和民族工作资料、电影宣传资料、电影说明书以及对历史亲历者的访谈来看,边疆地区的电影事业主要服务于向边疆民族地区宣传国家政策、增进民族团结,进而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务。

有关电影工业技术在边疆地区发展的研究有待展开,如“三线建设”中的电影机械工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自主的电影工业体系。除去在边疆地区设立电影制片厂外,在“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长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光磁研究、胶片生产、机械制造、电影器材维修与物资供应等电影工业机构也迁入边疆地区。⁽¹⁶⁾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国逐渐摆脱电影物资的对外依赖,到1980年逐步形成了可满足自身需求的电影工业体系。⁽¹⁷⁾这段历史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至关重要,相关史料尚未被充分利用,且亟待抢救保护。

电影在边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也需要分析,如各时期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在基层的放映、接受和影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便成为了国家乡村、文化、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和落实。时至今日,基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程仍在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放映的科教片及新闻纪录片,以电影为切入点,全面探究国家基层治理、政策执行和边疆社会演进的全貌。此外,考察不同时期影像如何表达中国的边疆与民族,亦是中國边疆电影史的组成部分。

(二) 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边疆与民族的影像无论虚构或纪实,都成为中国电影和边疆史地研究间具有“诗史互证”品格的材料。将有关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视作历史文献,围绕相关作品尽全力展开影像、档案、文件、书信、口述

资料的搜集和抢救,可以丰富中国电影史料,同时可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来自电影的历史文献。影像作品记录了中国边疆及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貌,为学者洞察特定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参考。同时,影像作品本身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体现着饱含时代精神的形式与风格。

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记录、美学探索,都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电影从历史底蕴中汲取创作灵感提供了重要参考。回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刘三姐》《阿诗玛》《孔雀公主》等由民间文学改编的影片,它们经历了由口述传统向视听语言的转化,并凭借影片的创作和传播而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经典。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电影化亦成为增强民族自信、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在继承前人包括电影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更加细致地重新审视这些作品从民间文学到电影的过程,可对当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画、游戏等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三) 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



图1. 电影放映队到怒江地区给傈僳族观众放映, 新华社记者李松青摄, 1954年3月20日

不同于都市影院中的电影放映,流动电影放映队的露天放映曾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主要的放映形式,且至今仍活跃于边疆民族地区(见图1)。中国基层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被视为“考察当代中国电影史和社会文化发展史的一扇重要窗口”,⁽¹⁸⁾因此可以调查不同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方式、放映空间,

并充分利用多种史料对边疆的流动电影放映史进行研究。就1949年前的史料而言,根据之前的调查,云南省档案馆可供调阅的有关电影条目近三分之二都与“教育电影巡回讲映团”有关;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可查涉及全国各地区的教育电影放映史料。各省、自治区以及下辖民族自治州、市有关电影的地方志亦有“教育电影巡回讲映团”放映活动记录。加之各类数据库建设使得民国报刊得以更好利用,可以预见相关研究成果在未来将不断增加。

1949年后的流动电影放映可用史料多集中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电影》《电影放映》等报刊,以及各省、自治区的日报。足具参考价值的除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外,还有各地编写的电影志和文化艺术志中有关电影的章节。然而,各地区电影工作资料、电影宣传资料、放映人员培训资料等涉及边疆电影放映的资料方面,尚需开展整理和汇编工作。对当时边疆电影放映亲历者的访谈和口述资料亦值得关注。近年来,相关学者如郭建斌、李洁等人利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基层电影放映进行了系列研究,为区域电影放映研究提供了鲜活资料。⁽²⁰⁾



图2.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彝族、哈尼族、汉族观众一同观看哈尼语译制的电影放映⁽¹⁹⁾

(四) 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为帮助边疆少数民族观众看懂电影,国家组织建设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主要将汉语电影翻译和配音为少数民族语言,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放映。之前较少受到关注的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在学术层面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研究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历史,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发展情况。麻争旗、金海娜、信

莉丽等曾对我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纲性地概括和历史梳理,⁽²¹⁾对其价值和意义展开了探讨。⁽²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有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自治区先后开展了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其于1964年总结并向全国推广的“影片口译对白解说经验”之上。⁽²³⁾对于全国其他地区 and 阶段的民族语电影译制研究而言还有进一步深入阐发的空间。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基础史料工作尚待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访谈,记录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整理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故事片、纪录片和科教片台词本,从而为系统梳理和还原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历史,分析民族语电影译制在宣传国家政策、文化戍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效果提供史料基础。



图3. 少数民族语电影配音演员在为影片配音,临沧市农村电影管理站(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提供

三、从西南边疆电影放映史料搜集看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的意义与价值

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史料搜集情况看,相关资料总体较散碎,连续性不足,缺乏系统的史料集成。随着亲历者年事已高、相继离世,也亟需开展口述采集。边疆电影史料搜集面临的困难既有政治历史等客观因素,也因相关资料未得到应有重视所致。一些地方因电影机构改革、电影组织裁撤和场地动迁等原因,电影资料严重流失。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边疆电影史研究尚待展开,相关史料的电影价值、学术价

值和政治价值都未得到充分认识。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可以接续和补充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内容，并为多学科研究提供电影角度的资源，为中国现代国家社会构建提供电影史实确证。在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可谓恰逢其时。

（一）中国边疆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有机组成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²⁴⁾ 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并依此“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方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及优势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²⁵⁾ 随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起步，立足中国电影的“本土经验”和“生动实践”，从中探寻具有中国性及主体性的电影研究，就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任务。⁽²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系统构建是对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接续，同时也是对“重写电影史”大潮下的电影文化史、电影传播史、电影社会史、电影产业史等电影专门史的补充。作为中国电影史的丰碑以及范式奠定之作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论述了从1896年至1949年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勾勒了建国前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及发展脉络”。⁽²⁷⁾ 尽管近三十多年来，在“重写电影史”号召下产生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中国电影史著述和研究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电影史的论述仍局限于都市文化及“精英文化取向”之上。⁽²⁸⁾ 诚然，中国电影肇起于都市之中，但事实上，广大乡野中的各民族同胞第一次看到电影，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及全国且规模浩大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的建立才得以实现。过往电影史叙述对于需要进行日久岁深史料搜集与田野调查的边疆电影研究缺乏兴趣。这使得有关中国边疆的电影和电影史研究，在少数民族研究视角之外仍存在诸多空白。开展边疆电影史研究可以更好地呈现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貌，也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尚未充分讨论的在地电影经验的学术建构。

如前所述，近年来有关中国边疆与民族地区的电影和电影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有关中国边疆电影的研究呈现出向区域和基层下渗的趋势。研究中国边疆电影的学者学科背景多元，在电影学之外，还涉及翻

译学、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这一研究特点也体现出中国边疆电影研究如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般，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

（二）中国边疆电影史是跨媒介与跨学科的电影史

中国边疆电影史的构建不仅是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接续与补充，其本身还是一种兼具跨媒介和跨学科特质的电影史，可以为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传播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提供立足电影的研究洞见与资源。

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中，一些在地的电影现象呈现出跨媒介和多模态的特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民族访问团和民族工作队将电影带到边疆民族地区放映时，从未接触过电影的观众难以看懂影片内容，因此时常造成误会。为了帮助观众看懂电影，各地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用民族文字、图片、幻灯、民歌、说唱、快板等形式对影片进行介绍和解释。⁽²⁹⁾ 这种用地方性知识去翻译和阐释作为外来文化系统的电影的尝试，使得电影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放映具有了某种跨媒介特征的同时，其民俗特点也异常显著。在田野调查中，受访人描述了20世纪50—90年代当地村民欢欣鼓舞、杀猪宰羊、热烈欢迎放映队的情景，称放映现场“如同过节”一般人山人海。⁽³⁰⁾ 一些展示的照片还可以看到人们在映前及映后载歌载舞的情况(见图2)。



图4. 纳西族观众围绕放映机跳舞⁽³¹⁾

从技术角度而言，在普及电影放映的努力中，亦出现了特色鲜明的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良，如极大提高了少数民族语译制放映效率的涂磁录还音技术，⁽³²⁾ 使流动放映更加便携的8.75mm胶片和放映机等。⁽³³⁾ 在田野调查中，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工作者提及，对于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被译制的电影

还具有保存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功能。一方面，民族语言得以通过媒介技术被储存下来；另一方面，翻译的新词术语亦通过电影放映得以传播，并丰富了民族语的内容。

上述现象意味着，如果从单一学科出发，将难以对边疆电影现象进行全面研究及合理解释，边疆电影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使其成为各学科对话的理想立足点。中国边疆观众初识电影的经验 and 记忆，将作为外来文化系统的电影翻译为本土文化的跨媒介实践，媒介技术与历史记忆的塑造与储存等史实，对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乃至其他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中国边疆电影史是电影参与国家构建的亲证

从中国电影在边疆地区的活动来看，它深度参与到国家构建之中，是国家和社会构建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了唤起边疆民众的国家意识，国民政府就曾以动员为目的，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过“教育电影巡回讲映团”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放映参与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访问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参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边界勘定的谈判，电影工业也在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电影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边疆的电影事业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

边疆电影史和电影研究同时也是对当下国家宏大叙事和方针战略的参与和回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流动电影放映增进了边疆民族地区观众的国家认同。在田野调查中，一些观众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看作是本民族的经典文艺作品。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现已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其观影体验亦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历史记忆。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活动显然承载着国家的政治意图。笔者在实地考察中

发现，这些政治意图的实现和表达与在地文化系统交织在一起。放映员、民族语电影译配人员以及边疆电影工作者已成为介于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当代士绅”。流动电影放映在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还为观众带去了农畜牧以及科教文卫知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中，电影放映还为乡村的社会治理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

在对外文化交流和“走出去”的背景下，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服务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跨境民族。他们分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通过民族语译制的影视作品，中国电影已经在周边传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不仅增强了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也为中国电影在国际间的传播打开了新的通道。

总之，在边疆民族地区，电影深度参与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电影在传承民族记忆的同时也在发展地方文化，并在塑造国家认同、促进对外交流方面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结语

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是当代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电影史学者走出书斋，深入边疆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虽然重要但其中也存在挑战，尤其是面临史料匮乏和跨学科合作不足的情况。边疆电影史料的系统性搜集与整理，是研究边疆电影史的基础。边疆电影史研究的开展，不仅需要电影史专家的参与，还需要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通力协作，以充分反映中国边疆电影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一部系统而翔实的“中国边疆电影史”问世，为学界和社会提供宝贵的电影历史资源。

(1) (1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3)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4) (9) 冯建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5) (6) (8) 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7) (10) 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

(12) Jeffrey Klenotic, Putting Cinema History on the Map: Using G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ity of Cinema, in R. Maltby, D. Biltrey, and P. Meers eds., *Explorations in New Cinema History: Approaches and Case Studies*, Wiley-Blackwell, 2011, pp. 61-66.

(13) 叶月瑜、冯筱才、刘辉编《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 (14) 李道新《中国电影传播史(1949—1979)》，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21年版，第168页。
-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9页。
- (16) 刘乃中主编《中国电影物资产业系统主要历史文件汇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版，第97—98页。
- (17) 曲金魁《中国电影机械工业百年发展回眸(上)》，《现代电影技术》2006年第8期。
- (18) 李镇《行走的人民电影——20世纪50年代电影放映队研究》，《当代电影》2019年第10期。
- (19) 拍摄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2021年4月21日。
- (20) 郭建斌的相关论文如：郭建斌、王丽娜《“牧影”：中国流动电影放映再阐释——基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田野研究的讨论》，《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郭建斌、张静红、张翎、陈静静《“视觉展演”：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实践的文化阐释——基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田野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4期；郭建斌《国家电影：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之田野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李洁的相关论文有：Jie Li, Cinematic Guerrillas in Mao's China, *Screen*, vol.61, no.2, 2020, pp. 207-229; Jie Li, The Hot Noise of Open-Air Cinema, *Grey Room*, no.81, 2020, pp.6-35.
- (21) Haina Jin, Film Translation into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28, no. 4, 2019, pp. 575-587.
- (22) 麻争旗、信莉丽《民族语译制研究的问题与思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 (23) 相关研究如：金海娜、柳谦《“延边经验”：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解说员的配音实践(1949—1966)》，《当代电影》2023年第9期；刘润坤《互动仪式链：“十七年”时期农村电影放映的社会传播学机制——以延边州和龙县第一放映队为例》，《当代电影》2023年第1期。
- (24)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2023年10月14日访问。
- (25) 潘玥斐《“三大体系”建设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迈向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2日。
- (26) 李道新《主体性与知识论视域里的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电影艺术》2023年第4期。
- (27) (28) 陈山《“重读”与“重写”——史学意识观照下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当代电影》2012年第10期。
- (29) 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文化艺术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893页。
- (30) 原云南电影放映大队部第一电影队队长木光访谈，临沧市临翔区，2020年8月27日；苗族文化学者、翻译家、配音演员侯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2020年8月18日。
- (31) 拍摄于农村电影历史博物馆(大理电影档案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2020年7月5日。
- (32) 《“影片涂磁录还音”装置试制成功》，《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5日。
- (33) 《北京电影学院志》编委会《北京电影学院志》，北京：北京电影学院 2000年，第316—317页。